

新文化巨人鲁迅五十年祭



祭

湖北省鲁迅研究学会 编

新文化巨人鲁迅五十年祭

湖北省鲁迅研究学会编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1/32 8印张 202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620

ISBN 7—307—00280—9/I·11

定价: 2.60元

总序

木芝

五卷附录

目 录

鲁迅对我们三十年代青年的哺育·····	李 蕤 (1)
关于鲁迅前期进化论问题·····	陈安湖 (11)
鲁迅人道主义思想二题·····	皇甫积庆 (30)
试论鲁迅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化的开放性	
理论·····	郭 成 (46)
谈鲁迅的小说观·····	谢韵梅 (62)
阿Q六十五年祭·····	李尔重 (77)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及其他·····	唐达晖 (86)
论阿Q主义与反封建主义·····	易竹贤 (103)
试论《伤逝》悲剧成因及其意义·····	孙续恩 (119)
试论狂人形象的双层建构·····	张足先 (134)
《风波》技巧谈·····	高长舒 (146)
在一个宗教的王国里——祥林嫂悲剧	
新探·····	沈光明 (158)
论爱姑及其悲剧·····	陈敬中 (171)
深层的讽刺艺术——鲁迅小说美学之一·····	汪修荣 (186)
创造典型环境和情节的高超艺术——鲁迅	
小说次要人物研究之一·····	童秉国 (194)
论《野草》的象征体系·····	吴凤祥 (203)
鲁迅杂文形象的成象途径·····	皮远长 (214)

“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试论鲁迅杂文

艺术“技巧的上达” 黄芥田 (228)

漫谈鲁迅的译诗 官春临 (240)

鲁迅对我们三十年代青年的哺育

李 蕤

鲁迅在他的《自嘲》一诗中，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名言。许广平在悼念他的诗里，也说过：“你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是的，鲁迅对于革命，对于人民，对于青年，的确是一条忠实的老黄牛，在中国的大地上，辛勤耕耘了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光辉著作，正象营养丰富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五四”以来，每一个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都直接或间接接受过他的影响，受过他乳汁的哺育。我，这个三十年代青年，也是得到他的哺育长大的。

我生长在河南农村，自幼家贫丧父，读书很晚，十二岁才考进县里的“高等小学”。那时，一个县只有一所国立小学，被称为“洋学堂”。讲的功课，有算术、国文、历史、地理，还有音乐、体操，与在私塾时每天向孔老夫子的牌位作揖，只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之类的东西，已经大异其趣了。记得当时正是“五四”爆发以后，全国罢工罢课，反对袁世凯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在我们河南荣阳那样一个偏僻的县城，老师们也带着我们举行游行示威，打着小旗子，绕全城进行反日宣传。记得当时的口号，有“愿将头颅掷向东洋岛，以鲜血淹死倭寇”，有的老师讲演，大声疾呼：“我们地大物博，有四万万同胞，每一个人撒一泡

尿，便可以淹死小日本”。当时我们才十来岁，懵懵懂懂，自然什么也弄不清楚，但小小的心田里却留下很深的阴影：二十一条是可怕的卖国条约，“小日本”是侵略的强盗，我们的国家是受人欺侮的。

那时的国文课，已经讲白话文了。为了向我们灌输新思想，国文老师给我们介绍“五四”以后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大半是同情穷人的。记得有一篇短篇小说，描写一个马车夫，深夜为老爷赶车，而那个老爷总嫌车子跑得慢，不断打骂车夫；后来，那马车夫跳下车子，跑掉了，丢下那老爷独自坐在黑夜荒郊外的马车里，又哭又喊，却没人应声。我们觉得很痛快。另有一首诗题名《卖馒头》，写卖馒头的小贩喊得声嘶力竭，却没人买，“这个嫌咸，那个嫌淡，有的还说馅儿不新鲜”，引起我们的深切同情。也有老师给我们讲《狂人日记》，但不懂，只感到那疯子的可怕。倒是胡适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却一直牢牢记在心里。

“高等小学”毕业时，我已十五岁。因为那时候全县只有这么一个“洋学堂”，毕业时还第一次照了个半身像。然而家里穷，无力再升学，只好跟着我的二叔父“打牛腿”——做庄稼活。

其时，我的三叔父赵振中在洛阳“河南省立第四师范”读书。每年寒暑假回来，总带许多新书和新杂志，象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彷徨》，还有《语丝》、《沉钟》、《莽原》，应有尽有。三叔当时也反对读经，赞成白话文、新文学。假期间，三里五村的在外地求学的同学朋友们还互相走访，在一起高谈阔论，或谈国家命运，或论青年出路，或围绕一篇作品，争得面红耳赤。有一次，我

听他们争论鲁迅的《药》，有人说好，写得深刻；有人却说太悲观了，夏瑜为了革命被杀了头，老栓却还用馒头蘸他的血治儿子的痼病，结果儿子也死掉了。这样写，中国有什么希望啊！有人反驳说，就是应该这样写，中国老百姓，当前就是这样的愚昧，革命不“唤起民众”，是不可能成功的。我那时年轻无知，无法辨别是非，但却由此对鲁迅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祝福》、《故乡》，我都觉得写得好，读起来亲切，因为象祥林嫂那样的妇女，闰土那样的农民，好象就在我自己的身边；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左邻右舍甚至家人的影子。

然而，我这时候更喜欢的，还是创造社、太阳社那些作家的作品，感到他们的作品确象“太阳”一样，使人觉得一片光明。郭沫若的《女神》，我几乎篇篇可以背诵，象《创造者之歌》、《匪徒颂》，读后令人心壮思飞，好象自己也超凡入圣，成了英雄。蒋光赤的《鸭绿江上》、《短裤党》等，读了也觉得“过瘾”，对鲁迅的作品，感到太“沉重”了。

但“过瘾”之后，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我却觉得一片空虚。看看自己，仍是上不沾天下不沾地的一个可怜的小知识分子，吃不饱穿不暖，毫无出路；看看周围的农民，象阿Q和闰土那样的倒是多数，一个个被贫穷和愚昧压得弯腰曲背，麻木迟钝，见有钱有势的人便既害怕又羡慕，敢用斧头杀死地主老爷的却一个也没有。于是非常失望，苦闷。有时读起郭沫若的《死的诱惑》，反而得到快慰。这时，回过头来重读鲁迅的作品，读到他要青年“敢想、敢说、敢哭、敢笑、敢打、敢骂”，读到路是人走出来的，“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便感到有些意思了。

1927年，国共两党联合的北伐大军，震撼着大半个中国。但阳光还没有照到北中国的农村，“四·一二”的大屠杀已经在南方开始。然而，象我这样在偏僻农村的“止水下层”中生活的人，对这些全不了解。当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五原誓师，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赶走奉系军阀张作霖，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土豪劣绅”，进入中原的时候，我也兴奋异常，站在路边欢迎他的队伍。接着，查放脚呀，禁鸦片呀，反对封建迷信呀，大闹了一阵。这时候，我以为梦想的光明已经到来，也跟着摇旗呐喊，东跑西奔，打了不少神像，拆了不少庙宇，扯碎了不少妇女的裹脚布。然而很快的，一切又恢复旧观，这些所谓的改革只象无根的浮萍，一切又坠入原来的黑暗中。

这次小小的震荡，却也把我这样一粒沙似的小人物震荡了出来。1927年，我考入洛阳“省立第四师范”。那个学校，学生每月有六块大洋的津贴，这对穷学生是天大的福音；尤其是思想上，使我眼界大开。那时，大革命刚刚失败，蒋介石正忙于军事统一，还来不及对教育进行控制。原来战斗在第一线的革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不少人退到学校来找避风港。我们学校便有几个这样的教员。教“公民”的马子任实际讲的是历史唯物论；讲史地的教员孟庆兰，讲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教国文的孙席珍，讲的是革命的文艺观。出版界也颇为活跃，出了许多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的书；文艺读物也如雨后春笋，中国的，外国的，高尔基、辛克莱、杰克·伦敦、罗曼·罗兰、巴比塞的作品，都可以买到。学校里，读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书刊，成了风气。思想进步的同学纷纷成立读书会，越过班级的界限，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这时候，根本无心读“教学

法”、“教材研究”之类的正经功课，全部时间和精力扑到对未来的理想、国家命运的探索上。

这时候，鲁迅的著作是我们读书会的主要读物。通过讨论，我们懂得了“阿Q”大团圆时画的圆圈所代表的意义，懂得了鲁迅为什么主张少读中国的线装书，懂得了《风波》中七斤的一条辫子所代表的深刻含义。总之，从这时候起，我们才多多少少读懂了鲁迅的书，也开始热爱他的著作了。

自然，过不多久，学校这样的自由空气便没有了。进步教师有的被解聘，有的被赶走。同学们的读书会也被宣布为非法，还有的学生被开除学籍。然而，种到脑子里的真理，却赶不走，开除不了，在每个人的头脑里牢牢生根了。

1931年，日本侵略者兵不血刃攻入沈阳，张学良奉命毫不抵抗，使东北三省无声沦亡。这一丧权辱国的大事变，激起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一·二八”淞沪战后，蒋介石政府一方面命令十九路军撤退，一方面仓惶出走，跑到洛阳，把洛阳定为“行都”。洛阳人民以学生为先锋，集会游行，到洛阳西工请愿，要求政府立刻下令抗日。当时汪精卫的假面具尚未撕破，许多人还认为他是“左派”，要求汪亲自接见，结果汪推说不在，由叶楚傖出面，支支吾吾，应付几句了事。同学们对此十分气愤。而我们一群读过鲁迅著作的同学却比较冷静，因为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早已告诉我们“不要再请愿”的真理，对那个对外屈膝媚敌，对内残酷镇压的反动政府，我们早已不抱任何幻想。

1932年秋，我从洛师毕业后，又考入开封“省立第一师范”的高师班，在国文班读书。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压制爱国舆论，对学校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训育主任皮某，本身就是军统特务，除了经常派遣军警公开逮捕参

加革命活动的学生外，还用极阴险的办法迫害学生。每到学期终了，以“操行不及格”为口实，斥令学生退学。与此同时，他还收买特务学生，在学生中发展国民党小派系，谁不参加便视为异端，列入黑名单。这时，也正是鲁迅在上海与反动派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他的许多揭露反动派罪恶的作品，说了我们每个人想说而说不出的话，增长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1935年暑假，我从开封“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定，师范生毕业时可以到江南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参观学习。借此机会，我到了上海。到上海的第一件事，是跑到北新书局买鲁迅的杂文集。当时白色恐怖达于极点，进步书刊都被查禁，鲁迅的杂文更到处买不到。北新书局的店伙，一开始也连连摇头说没有，经过再三央求，说明我们是不远千里而来的青年，敬慕鲁迅，他才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叠来，有《二心集》、《三闲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且介亭杂文》等，一大摞子。我一见，真是如获至宝，每种都买了一册。记得从上海到杭州的途中，夜深人静，车厢里旅客都睡得前仰后合，我一个人却在聚精会神地读鲁迅的杂文。读到许多幽默的地方，不自觉地一个人笑出声来。鲁迅的杂文，笔锋犀利，有如会点穴的拳师，三拳两脚便把对手打翻在地，而笔调生动幽默，读起来如醍醐灌顶，令人心醉，是最好的艺术享受。这一记忆，事隔50年，但恍如昨日，仍历历在目。

从此以后，鲁迅的杂文只要一发表，我全不放过。久而久之，连他经常不断变换化名的作品，也能立刻分辨得出来。

抗战爆发前夕，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一方面

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冀东沦陷，平津亦将不保；另一方面，虽然这时工农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并提出了联合抗日救国的纲领，但国民党反动派仍不顾全国民意，一意孤行，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的卖国投降政策。鲁迅的杂文，象一支支犀利的投枪、匕首，剥掉敌人的画皮，露出他们既凶残又卑劣的本像。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人的生命圈》。文章尖锐指出，中国大地有两个圈子，一个大圈子里面套着小圈子，日本人不断从外边炸进来，国民党军队不断炸进去（向工农红军苏区），这样，“边疆上是炸、炸、炸，腹地也是炸、炸、炸。虽然一面是别人炸，一面是自己炸，炸手不同，而被炸则一。”这样，中国人的“生命圈”便越来越缩小，成为“生命线”，再下去，“这生命圈便完结而为‘生命0’”。这篇文章生动地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再继续下去，亡国之祸便迫到眉睫；同时也使人清清楚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继续“剿共”，就是为日本侵略军开路。这样的好文章，对我们当时的抗日青年是有很大启发的。

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不思虑如何挽回危局，反而将大批古物南迁。于是北平学生人心惶惶，有些因此南逃。而反动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却板起面孔，责备学生在“国难当头”时应该“赴难”，逃离是可耻的；他们还操纵无知的童子军，骂南逃的大学生是“遗臭万年”。由于他们打的是漂亮的旗子，一时也颇迷惑一些人。鲁迅挺身而出，为学生的南逃辩护。他在《逃的辩护》一文中，愤慨地指出：“我们还记得，自前年冬天以来学生是怎样闹的，有的要南来，有的要北上，南来北上，都不给开车。待到到得首都，顿首请愿，却不料‘为反动派所利用’，许多头都恰巧‘碰’在刺刀和枪柄上，有的竟‘自行失足落水’而死了。”因此，他

们接受过去的教训，走散，回家，“这正是这几年来教育显了成效”。寥寥几笔，把几年来反动政府对爱国学生的残酷镇压，及今天企图把学生作为他们不抵抗主义的替罪羊的阴谋，一下子戳穿。我们读了真感到痛快极了。

当时的中国托洛斯基派，在青年中还有一定的蛊惑力。他们以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为借口，攻击毛泽东等同志的联合抗日是“在斯大林官僚主义的指导下，再一次把中国革命交给大刽子手”。这种貌似革命的理论，很投合一部分有“左倾幼稚病”的青年的口味。我有一个同学，对“联合抗日”便一直抱“冷口笑”的态度，我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讲的就是托派的这一套理论。待到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公开发表以后，那个同学看了大为震动，找到我们说：

“鲁迅说得对，说得好，他们那种无产阶级单独抗日的主张，虽然‘高超’，但只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会从天上落到最不干净的地方。”他心悦诚服认识到过去的错误，后来成为抗日阵营中的积极分子。

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事实确实如此。当时我们一般文学青年，没有党的直接领导，许多重大问题，都是以鲁迅的态度为依归。我们对鲁迅有高度的尊敬和信任感，因为，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是代表中国人民和革命利益的。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突然在上海病逝。噩耗传来，我们一群文学青年，感到象黑夜里行军突然失去路灯一样，比失去自己的亲人还痛苦。我们在开封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并在黎烈文编的《中流》上写了悼念这位伟人的一篇文章。那一年，苏联失去了高尔基，中国失去了鲁迅。他们的死，对于革命文学是难以弥补的损失。给我们带来的悲恸也是难以

言喻的。然而，我们都认为他们没有死，他们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他们的死将激起人们更大的悲愤，激起更大的力量。

鲁迅和我们长别已经五十年了。但每当我们30年代的文友碰在一起，谈到鲁迅时，无不感激他对我们的哺育，同时还感到：虽然他已不在人间，但好象依然健在，和我们一道生活战斗。不仅30年代的朋友们是如此，40年代、50年代成长起来的也都如此。这自然毫不奇怪，因为鲁迅的方向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他的文艺思想和方针，和党是一致的，生长战斗在党领导下的文艺战士，怎能不受鲁迅的影响和哺育呢。

从我自己说，感到即使在他逝世之后，仍然受他思想的哺育，感到他仿佛仍在领导我们前进。1948年，解放大军渡江前夕，新华社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同时针对国民党政府假和谈阴谋，全文广播了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全国各报都相继刊登，在武装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上，起了动员千军万马的作用。从那时开始，我就更相信鲁迅精神是不死的。

50年来，作为文艺战线上的一个老兵，每遇到重大问题，感到恍惚的时候，往往直觉地便想起鲁迅，就要想一想：如果鲁迅活着，他会怎样看待？当我临歧的时候，便想到他当年的“不哭也不返，坐在路边好好想一想”的教导；当我面对真理却不敢坚持的时候，便想一想鲁迅当年“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精神；当“左”的思潮泛滥的时候，我就重读鲁迅的《彻底与透底》，琢磨其中的道理；当我遇到接受中外文化遗产中的问题时，就从他的《拿来主义》中寻找有益的借鉴；当我在革命阵营内部遇到粗暴的对待或误会时，

就想到当年鲁迅的“为战友所误伤，便躲在草丛中舐干自己的血，继续战斗”的教导，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50年来，我之所以还能在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活过来，是和鲁迅的哺育分不开的。

因此，今天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我和已往一样，感觉到鲁迅的精神一点没有死。它将永远伴随着我们，指导我们前进的道路，一直到共产主义的明天。

1986年8月17日，河南鸡公山

关于鲁迅前期进化论问题

陈 安 湖

鲁迅前期的进化论，是他应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来观察社会问题所形成的思想。自从19世纪50年代末达尔文创建了生物进化论以来，应用它来观察社会问题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是很多的。中国从19世纪末生物进化论传进来以后，也有不少思想家和文学家，把它作为观察社会问题、进行社会改革的武器，由此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思潮，对中国当时腐朽的封建专制和传统思想进行了有力的冲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便会发现，这众多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尽管同样信奉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但由此所形成的社会思想体系，却有着不同的性质，起着不同的社会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阶级，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来观察社会问题的缘故。

鲁迅接受生物进化论，也始于19世纪末它传进中国不久的时候。当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灾祸正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寻找革命真理”。^①鲁迅正是这时候到日本留学，选择了进化论作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武器。不同的是鲁迅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同下层农民保持密切的联系，特别强烈地感受到封建社会的腐烂、民族的危亡

和人民的痛苦。因此，在他的进化论思想里，就渗透着一种特别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彻底的革命精神，不同于国内外的某些信奉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我们研究鲁迅前期的进化论思想，一定要弄清楚它和别的社会进化论根本不同的地方，首先要弄清楚它同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庸俗进化论不同的地方，知道它既是为弱小民族谋解放的武器，又是他彻底革命的武器，这样才能认识它在当时的强烈的战斗作用以及它所创造的光辉的战斗业绩，评定它在历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也由此认识到鲁迅作为文化革命主将和旗手的伟大历史作用。

近年来，我们对鲁迅前期进化论思想的研究是有成绩的，但我也感到似乎也存在一些问题。有些研究者虽然主观上也想探索鲁迅前期进化论的历史价值和意义，但在实际上否定了这种性质，把它混同于庸俗进化论，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这里我想就王富仁同志的博士论文中有关这问题的观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1985年第三、第四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王富仁同志的学位论文《〈呐喊〉〈彷徨〉综论》，集中清算了解放几十年来鲁迅小说的研究传统，明确提出创建“新的更完备的”“研究系统”的主张，在鲁迅研究领域里很引起大家的注意，被认为是多年来（也许是几十年来）鲁迅小说研究的突破。王富仁同志联系鲁迅的小说，也研究了鲁迅前期进化论思想，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这成了他的鲁迅小说论的重要理论基础。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他的理论。首先从他下面一段话谈起：

鲁迅前期进化论思想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意识形态

变革的根本规律，他在接受了外国进化论学说之后，便主要运用于观察分析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实际状况，形成了他的社会思想和社会伦理道德的进化发展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规律取得了适应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赋予了《呐喊》和《彷徨》以巨大的思想生命力和艺术生命力。

读了这一段话，人们或许会认为王富仁同志这里是把鲁迅前期的进化论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混同起来了。因为谁都知道，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阶级斗争是推动它向前发展的动力。在这个社会里，既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又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之间存在着曲折复杂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由此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面貌及其发展趋势。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实质上，就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为主体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奴化思想进行斗争，并逐步取代它们的过程。离开阶级斗争，就无法认识中国现代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自然也无法说明中国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根本规律。鲁迅前期的进化论思想，既然建立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没有从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变革，怎么能说它“反映了中国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根本规律”？这样看来，它不是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区别了么？

事实上，王富仁同志所说的“中国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根本规律”，并不是指马克思主义所阐明，又为现实生活所证明了的客观实际的规律，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已体现了的科学的规律，而是他按照别的哲学观点、别的研究方法所探索出来的另一种规律，因此也就不